

#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

##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 流坑民間契約的重要發現

邵鴻

南昌大學歷史系

從 1992 年春我們開始在流坑這個千年古村進行調查研究以來，一直有一個很大的遺憾：與保存完好的眾多族譜資料形成鮮明反差，這裏的民間契約文書非常罕見。然而，今年暑假，這個遺憾終於得到了補償。

今年 8 月 24 日，我陪幾位朋友到流坑游覽（近年由於傳媒渲染，流坑已成為江西的一個旅遊點），得到我的幾位流坑籍學生的熱情接待。當我向他們詢問契約文書的線索時，一位董姓同學告訴我他家裏有些東西，請我去看看。翌晨到了他家，董同學的父親打開一個陳舊的小書箱，裏面除了十餘冊清刻本經書和 1910 至 20 年代的學堂課本外，還有一些捆扎得整整齊齊的小黃紙包，打開一看，全是墨寫的契約文書！這一發現，令我大喜過望，真是應了那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董同學家的這批契約文書共有 87 件；加上我的另一位也是姓董的學生隨後提供的 8 件，總計為 95 件。經初步整理，計清代 36 件（其中同治年間 5 件，光緒 25 件，宣統 6 件），民國 52 件，不詳 3 件，1949 年以後 4 件。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山林、水塘、器物、股權等方面的買賣、典押和租借契約，以及銀錢往來票據和分關文書等。而其中的絕大部分，屬於董同學的曾祖父個人。根據族譜和回憶，董同學的曾祖父出生於 1873 年，卒年不詳（但在這批契約裏，1942 年以後訂立的契約中，他的名字沒有出現，當事人變成他的妻

子，由此推測，他可能在上一年或當年早些時候去世），屬流坑八房之一的胤隆房，成年後從事商業活動發家，可能沒有捐官。其子從小讀書，父親故去後家道漸落，靠種田和放排為生，土改時被評為上中農，1994 年去世。董同學家的這批契約文書，就是他生前與他的課本一起妥善保留於書箱內的。顯然，如果不是董同學的曾祖父發家於前，他家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契約；如果其子沒有讀書人的素質，或者繼續保持了其父的經濟地位而難逃土改和文革的劫難，這批契約文書也不可能保存至今。個中機緣，頗值深思，也為我們今後尋找類似材料提供了啟示和路徑。

本次發現的這批契約文書，不僅可以使我們確切地了解當地清代中期以來的契約文書和財產交易的一般形式，更有助於我們認識流坑社區和宗族內部許多以往所不知的情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最為值得重視的也許是，由於它們大部分屬於一個家庭，從而有可能較清晰地展現和重構該家庭數十年間的財產變動的實際；同時，由於流坑族譜等資料的完備，也比較容易明確大多數有關當事人的房支、地位、財產以及標的物的位置、屬性等狀況，為我們對流坑社會進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這批資料也很有用處。舉例來說，過去我曾研究過流坑的會社組織，提出這裏的會社可以分為義會和利會兩種，總的趨勢是利會取代義會，但材料尚有欠缺。而這批資料裏，至少有 8 件關於會的契約或文書，從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清後期以來的會具有明顯的股份制利益體的特徵，因而會員資格可以買賣、繼承、分割和出典，證實了我們原來的分析，也豐富了我們對會的認識。又如人民公社化以後，土地屬於集體不能買賣，但是這次收集到的兩件書於1966年的契約，

一件是買賣菜地，一件是贈送房基地，這對認識公社時期流坑土地實況無疑也很有幫助。因為這兩份契約在文字和內容上都很有意思，特附在文後以饗讀者，並作為這篇短文的結束。

#### 附錄一

立杜絕契字人本族百巷林藻華同男侄如璋、如填，緣因先父借貸未還償清，自情願將伯父受分己業坐落地名本村中和門街上齊盤街菜園土捌股共得貳股，東與魚塘為界，西與荒基高堪牆為界，南與老鼠姑菜土為界，北與壽松姑菜土為界，四址界限俱載明白。今將此菜園土肆隔出賣，盡問親支連業人等，俱稱無銀不願承交，憑介紹召到本族下屋王喜容女士同男緣福名下向前承買。當日三面言定，時值價銀兩整，其銀執字之日兩相交楚，不少分文。此業未賣之先，并未重行典當，又非准折債負之類，如有來歷不明，出業人自管清白，不干承買人之事。二比情願，固無抑迫。一定後，二家不許返悔，悔者依條罰價銀一半，仍不破此交易，亦不廢人公用。恐口無憑，立有杜絕契字為據。

立杜絕契据人本族百巷藻華同男侄如璋、如填

在場人 標水 壽松 同押

藻華書

公歷一九六六年歲在丙午七月

日立

#### 附錄二

立送地基字人本族龍巷義財同志，緣因解放受分來土地証所得己業，坐落地名本村棋盤街街上五桂坊下階右邊與禮君公祠、合作社門前對面路心荒基壹塊，坐東向西，右與義財同志廚房屋滴水檐前牆為界，左與戲台高牆為界，前與路心檐前水圳為界，后與高堪石牆為界，四址界限俱載明白。今將此荒地基石寸土個石不留，情願俱與送出給本村下屋王喜容女士同男董緣福同志名下承受，成就為這個社會主義建設創造者。一徑憑介紹本族金沙泉 老丁姑同本族下屋正保姑兩位同志執字。送受之日，三面言定，確雙方情願，固無強迫，如有來歷不明，送給人自管清白，不干承受人之事。日后兩家不許返悔。及時依當地領導人員分析明斷處理為原則，仍不破此創造業，再不異言。恐口無憑，立有送地基字為據。

立送地基字人本族龍巷義財同志

介紹人老丁、正保兩位同志

藻華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六六年歲次丙午四月

日立

## 中西文化的交匯點 - - 廣州

黃海妍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北端，是廣東省的省會所在地。自秦漢以來，廣州一直是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中國海路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由於廣州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在海內外貿易上的特殊地位，一向是外來文化傳入中國的前沿。

早期外來文化的傳入以宗教為主。不少傳教士與客商一道來到廣州，進行傳教活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禪宗的始祖，著名印度僧人菩提達摩，在廣州登陸並開展傳教活動，他登陸的地方被命名為“西來初地”，建有華林寺。到了唐代，伊斯蘭教傳教士和阿拉伯商人一起在廣州興建了中國最早的清真寺——懷聖寺，以此傳播伊斯蘭教。此外，祭祀海神的南海神廟中奉祀的印度商人達奚；以及華林寺後來興建的五百羅漢堂中，有意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元朝時來到中國）的塑像（作為五百羅漢之一），都說明了外來文化在廣州的影響力。

隨着廣州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為全國唯一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空前繁榮，廣州也成為西學東漸的要衝。廣州的每一個角落，廣州人生活的每一個部分，都有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子。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廣州的各類建築，從廣州的方言和戲劇，從保存下來的外銷畫和外銷瓷器，乃至民間使用的家具及各種裝飾，看到西方文化在廣州的深遠影響。在廣州，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是水乳交融的。

現存廣州的各類建築，是中西文化融匯的典型體現。這些建築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整個建築風格上採用西方的建築形式，這其中又包括由西方人設計建造的純粹的西式建築，例如沙面舊英法租界區裏的許多歐式建築。還有嶺南大學馬丁堂，（現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由美國紐約斯托頓事務所設計，於 1905 年建成，其平面為地道的“殖民地

式”，即在主要使用房間的周圍以柱廊形式將其圍合，是中國最早的一棟鋼筋混凝土建築。（《廣州文物志》頁 180）

又如廣東郵務管理局大樓，位於廣州沿江西路，請英國人設計，建成於 1916 年，是廣州近代較有代表性的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廣州文物志》頁 171）另外，粵海關大樓，現為廣州海關大樓，俗稱“大鐘樓”，位於沿江西路，英國建築師設計，1916 年落成，也是近代流傳到廣州的歐洲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典型。（《廣州文物志》頁 171）

再就是由中國人設計的仿西式風格的建築。如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墓園，是一座由留美建築師設計的富有羅馬建築特色的陵園。（《廣州文物志》頁 253）又如廣州東山和西關的不少西式小洋樓，是晚清及民國時期廣州熱衷洋務的銀行買辦、達官貴人以及歸國華僑為自己建立的居所，這些小洋樓的廊柱、陽台、欄杆都是希臘或羅馬的風格。如位於廣州西關逢源北街的陳廉伯（沙面匯豐銀行買辦）公館，就是一座西洋別墅式三層洋樓。

第二類是糅合中西風格的建築，也可以說西式建築到廣州發生了演變。這類建築多建於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廣州最為典型和常見，反映了我國建築師早期的建築設計風格和手法，一方面因為受到西方正宗建築學院派的教育，具有設計手法新穎、思想開放的特點；同時又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仍然保留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就是其中之一，它建成於 1935 年，為廣州留美建築師設計，仿西方風格的凱旋門式拱門和自由女神像以及體現中國傳統風格的松鶴、福壽、祥雲等具有濃厚民間特色的紋飾，使這座建築兼具了西方古典形式以及中國傳統的民間藝術風格。（見黃佩賢：《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紀略》，《羊城文物博物研究》頁 184-189）

另外是現在廣州舊城區仍然能看到的騎樓建築。“騎樓”是在樓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馬路邊相互聯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長廊。它最早盛行於南歐、地中海一帶，本世紀初廣州開闢馬路時，在多處地方建起了這種可以避風雨、防日曬，特別適應南方潮濕多雨氣候的騎樓建築。（見《名城廣州常識》頁 31-32）它融匯了中西方建築文化，既在二樓以上採用西方古典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又受到中國傳統建築裝飾及風水學的影響。在廣州西關很多騎樓上繪有蝙蝠、如意等紋飾，象徵福到盈門，如意吉祥；而在一些騎樓的頂層裝有石獅子面向馬路，符合傳統風水學中以獅子辟邪除魔的理論。

除了在建築風格上模仿西方建築外，廣州傳統的建築中亦隨處可見西方的建築裝飾和技術。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明珠”的陳氏書院（俗稱陳家祠），是一座典型的嶺南祠堂建築，以各種建築裝飾而聞名。在這些傳統的建築裝飾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西式建築裝飾和技術的痕跡，例如磚雕中小天使的運用；還有月台上的鐵鑄欄板，在材料上引入西方的鐵鑄裝飾技術，在內容上卻全部是中國傳統的神話故事和傳說，如“金玉滿堂”圖、“麒麟鳳凰玉書”圖和“三羊啟泰”等等。至於傳統西關大屋中常見的套色蝕花玻璃窗裝飾，其蝕刻技術也是從西方引入的，但蝕花玻璃的內容卻十分傳統，如牡丹、梅花等圖案及一些傳統的中國山水畫等。在這裏，中西文化的融匯又一次得到了具體的反映。與建築相配套的家具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清代以後，隨著廣州海外貿易不斷發展，廣東酸枝家具的形式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藝術的精華，把中國傳統家具嚴謹、肅穆的藝術造型與西方傳入的各種家具形式結合起來，創造出線條流暢和諧，花樣多變的“廣式家具”。“廣式”家具的形成始於國外來料加工的“洋庄”家具的大量製造，之後各種洋人使用的西式家具式樣也很快在廣州流行，仿西式的家具隨之暢銷起來，成為許多家庭的常設用具。

除仿造西式家具外，廣州匠師更採取中西結合的辦法，以中國傳統家具基本結構為基礎，參照西歐家具的新穎樣式以及在雕刻上的細膩裝飾，造出

款式別緻的家具。至於家具上的雕刻紋飾，則既有反映中國傳統民間風俗文化的吉祥圖案，又有一些從西方傳入的洋花圖案。（見蔡易安《清代廣式家具》頁 31,65-68）

事實上，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除了建築和家具，一些工藝品的製作以及繪畫技術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其中包括自鳴鐘、外銷瓷和外銷畫。清代廣州製造的音樂自鳴鐘和“洋”彩瓷，開始是外國來樣定做的，不論造型或紋飾和西方製造的洋鐘、洋彩瓷沒有差別，到後來才被廣州工匠加以改良和創造發展。現藏廣州博物館的鎏金自鳴鐘，製造於清乾隆年間，就是清代廣州工匠仿照進口自鳴鐘的原理加以創造發展而成的。

而外銷的彩瓷，原料是購自江西景德鎮的白瓷，最初採用西方傳入的珐琅彩料，仿照西洋的畫法，其繪畫的內容迎合了當時西方人的要求，有西洋帆船、歐洲城堡、中世紀人物、禮拜堂、花園風景等，甚至是按照西洋名畫彩繪的。之後，外銷瓷的製作走上了中西合璧的道路，逐漸形成了現在所稱的廣彩。在彩繪技法上，一方面採用傳統的彩繪技法和工筆國畫的筆法，另一方面則是吸收、模仿西洋油畫、鋼筆畫的技法。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外銷瓷發展起來的廣彩到了成熟階段，大量銷往歐洲、美洲和東南亞，沙面租界的洋行以及廣州商人建立的瓷莊專門經營廣彩的外銷。

廣州外銷畫的出現也是如此。西方畫家的到來和西方油畫的進口，為廣州的畫人開闢了新的視野，他們很早就知道，在中國的卷軸丹青之外，還有油畫、水彩畫和水粉畫。他們或直接間接跟從西方畫家學習，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西畫的技法，從 18 世紀中葉開始，廣州已有相當數量的職業畫師在繪製西畫了，他們以西畫的材料，以西式的構圖，採用西畫的透視、明暗等技法，表現立體的景物。但在表現遠近空間時，仍有平板的感覺；在處理山石樹木、亭台屋宇和船舶時，不時露出中國傳統繪畫的痕跡。不過在繪畫題材上，則一反中國早期西畫那種以西方的聖像和中國的皇族為內容的宗教

氣息和宮廷氣息，把油畫創作的範圍推到廣闊的世俗社會中去，以中國民間古老的生活風情和沿海商埠新奇的景象為繪畫的主要內容，表現了清代中葉廣州的社會風貌。外銷畫在廣州盛極一時，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才衰落下去。（陳滢：《清代廣州的外銷畫》，《羊城文物博物研究》頁 369,372,378）

在廣州的語言和戲劇中也可以找尋到西方文化影響的痕跡。在語言方面，廣州口岸在早期的對外交往中產生了“廣東英語”。“廣東英語”專指在廣州的中國人與“西洋人”之間用作進行商業交易和往來媒介的獨特語言。它巧妙地運用聽慣了的外國音調，以發音相近的廣州話來表達，既沒有句法，又沒有邏輯聯繫，但卻成功地達到了讓廣州人與“西洋人”交流的目的。（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頁 44-47，“廣東英語”）在今天的廣州話中，仍有許多借詞的發音來自早期的“廣東英語”。例如摩登 - - modern，泵 - - pump，啤酒 - - beer，恤衫 - - shirt，菲林 - - film 等。

在廣州西學東漸風氣的影響下，傳統的地方劇種粵劇也受到了西方話劇的影響，在二、三十年代（1926-1936）進行了改良。在樂器方面，引入梵啞鈴（小提琴）、色土風、鋼琴等作伴奏。服裝方面，梨園名角競相採用從歐美引入的膠片；燈光採用電

影和西洋戲劇用的水銀燈，並學習話劇的布景方法。（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廣東省戲劇研究室編：《粵劇研究資料選》廣東戲劇研究室，1983年）

綜上所述，廣州對於西方文化的吸收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由開始的生搬硬套，到後來吸收西方先進的技法，再結合中國的傳統加以改造。可以說，幾乎每一件在廣州出現過的西方事物和技術，都被廣州人加以吸收和改造過，說明廣州人十分善於學習和西方有關的人和事，並善於不拘一格，融匯中西。廣州對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吸納過程也是持續不斷的，即使在鴉片戰爭後實行五口通商，廣州失去了在對外貿易上的優越地位以後，這種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也從來沒有停頓過，二、三十年代在廣州出現的中西合璧的建築以及粵劇的改良，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同時，在廣州形成的融匯中西的文化，對於中國沿海和內地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有眾多廣州商人移居的上海和香港。例如一度盛行於上海外國商館區和租界的所謂“洋涇濱英語”，實際上完全是“廣東英語”的翻版。

## Villagers' Community, Scholars' Community: An Outsider's View

Beatrice G. Faure

*(A four-day workshop co-organized by Xiamen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was held in Fujian from 11 to 14 July, 1997. Participants visited villages and temples in Fuzhou and Putian regions in the daytime and had round-table discussions in the evening. The following is written by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Beatrice, G. Faure, who is beginning First Year in Social Anthropology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is summer I saw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 had been on short trips before, but had always been occupied by the standards of hygiene, the food, or the comforts more

than truly attempting to see the world beyond my well-being, and look at the ways of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Of course, the China I saw was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whole country, as we visited a few locations in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 of Fujian. However, what I saw was deeply fascinating, and, to an “outsider” in every way, it was a definite eye-opener.

I was an “outsider”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Being the only “youngster” amongst a group of scholars, I was completely ignorant of their ways of thinking, observation, interests and points of view. I felt very much a “foreigner” in such an alien country, I was unfamiliar with everything from the food we were served in restaurants, to the ways of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Hence this is an article not only about the ways of life in the villages that I found interesting, but also of the practices of the scholars on the same trip.

The first interesting thing I found whilst we were walking around the temples, was that the temples are not simply buildings that hold records of the past, but are in fact, places of importance even in daily life today. From listening to many historians talking about the temples in the past, I often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were not so much in use today, but were record offices for the villages they served. However, as we travelled around, I realised that in fact nowadays they serve as some kind of community centres for the villages. They are places of worship, and certainly of record holding, as the communities’ achievements are well placed and elaborately recorded for all to see. Moreover, they also serve as places for the community to meet and spend their spare time, especially for the non-work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ies, i.e. the elderly and the children. Often elderly men sat outside the temples on bamboo armchairs passing their time talking or playing various games (or looking at us strangely as we visited their temples). Old women looked after the very young children, whilst chatting to each other, or preparing special packages for worship. The children also hung around at these temples, they were always running around the buildings, playing amongst themselves, or observing us closely whilst we were visiting. Sometimes there were even people finding shelter at the corners of the temples. Therefore the templ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communities even today.

I was also an “outsider” in the literal sense of the word. Wherever we went we were greeted by interested looks and close observation. The elderly were enthusiastic in sharing their knowledge with us, whilst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looked on with interest in the way we dressed, the equipment we held, in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our group. The children, on the other hand, were both shy and excited by our visit. Everywhere we went people were looking at us, the children would “subtly” come near us to have a closer look, and get very excited when I took their pictures. The reactions of the local people towards us were deeply fascinating. Some were excited, wanting to see what we were about, others were indifferent to our arrival. Others still were surprised at the knowledge some members of our group had on their communities. On several occasions I wanted very much to talk to them, but

unfortunately, not knowing their dialect, I had to rely on the basic skill of “looking friendly” and smiled instead.

As an outsider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I was also fascinated with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each member of our group took to what we saw. As there were both historians and anthropologists in the group, their interests were very different also. Moreover, even within the same discipline, people took interest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hings we saw. Many were immediately attracted by the inscriptions whilst others would take in everything. Some scholars obviously had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and only took note of those aspects of the temples, whilst others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 they found were unusual. Others still would collect all the data they could lay their hands on, whilst some would stand and soak up the atmosphere in each temple. However, the scholars were not as much interested in the places today, as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the villages, particularly the temples, nor were they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 temples as they stand nowadays.

I was also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of meetings. I had never been in official academic meetings before, so this was yet another eye-opener. I began to reali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meetings. They were places where ideas were exchanged, challenged, and developed. More importantly, they were where scholars met

other members in their fields, learnt about what each other was working on, and where they could liaise with one another. I was struck in the midst of the meetings, that eventually some of the ideas discussed in these meetings would appear in their publications and that one day I might be reading about them in print!

I had learnt such a great deal in the short period of five days in Fujian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cord them all in this article. Practically everything was new to me, from the customs of the local people, their particular religious beliefs, the Putonghua everyone spoke in the group, to the things that our group had observed. The only regret I had was that I had no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things we saw, and that I had not a particular aspect that I could focus on. As this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I tried to take in everything I saw. As the days went by, I realised that I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age of the temples today, and the reactions we received during our visits. There is such a great deal to be learnt, from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the various gods and goddesses that were worshipped, to the details of customs and the games the local people played in the temples that hopefully I will have more chance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m in the future.

## 庚午年（1990）粉嶺鄉太平清醮

區達仁、張瑞威

新界粉嶺鄉的太平清醮是每十年舉行一次，據村民的解釋，「打醮」的目的是「侍陰侍陽」，以祈求整鄉平安的慶典。

一九九零年，粉嶺鄉舉行了「太平清醮」，主要的儀式集中在農曆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公曆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廿九日至九一年一月二日），共三晝四夜，據一般的說法，這是一個「三朝醮」。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粉嶺鄉的「醮」只限於粉嶺彭氏一族，包括其女性成員，這從「人緣榜」可反映出來。另一有趣的是，粉嶺樓雖屬彭姓村，亦是祖先彭桂離開龍躍頭龍山後最早定居的地方。然而，粉嶺樓的彭氏是並沒有參加是次打醮。從訪問所知，在早期粉嶺樓亦有參加打醮，然而後期因一些財政問題，一直便沒有參與了。

是次打醮的財政總支出，從訪問所得，約港幣二百萬元，彭氏子孫每人捐三百，合海內外宗親的贊助，除卻所需支出外，還有餘款。

在這次太平清醮中，筆者參觀了那四天主要的儀式，現列一簡表，並作一簡單的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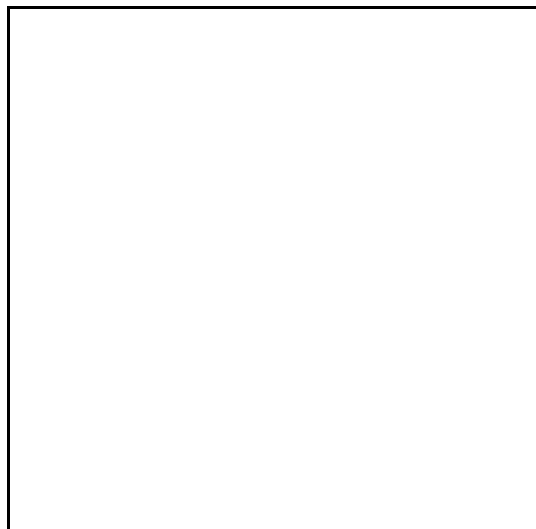
農曆月日	儀式
十一月十三日	取水（7:00-8:15a.m.） 揚幡 迎神（10:50-11:52a.m.） 奉神啟壇（2:00-3:00p.m.） 上三表（3:00-4:20p.m.）
十一月十四日 （正醮初日）	朝懺 啟人緣榜（3:35-5:30p.m.） 分燈（8:40-9:30p.m.） 禁壇（9:35-10:40p.m.）
十一月十五日 （正醮二日）	朝懺 行香（10:00a.m.-12:00） 祭小幽（8:00-9:35p.m.） 迎聖（10:00-11:00p.m.）

十一月十六日 （正醮三日）	朝懺 走文書（1:00p.m.-4:25p.m.） 放生、放水燈（4:30-4:50p.m.） 祭大幽（9:45p.m.-12:00）
十一月十七日	拉鴨扒船（早上） 送神（下午）

正醮前一日（十一月十三日）

早上六時四十五分左右，喃嘸與村民已齊集圍前出發取水，整個隊伍超過一百人，取水的地方是雞嶺村的一條坑水。據村民云，往雞嶺村取水是因為該處的水是神聖的，而且歷次打醮均往此地取水。

喃嘸在雞嶺村取水完畢後，村民立即打鑼打鼓，將所取之水利用鸞輿載返神棚。



圖一：粉嶺鄉位置圖

（此圖引自田仲一成《中國の宗族と演劇》，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5，頁722。）

於取水之同時，一些村民則在圍村的周圍豎立三個幡亭，亭旁插有竹枝，上面掛漂「幽燈」。由於這是三朝醮，故設三個幡亭，據說幡亭是迎聖的



地方，亦有說幽燈是給予遊魂示路的。

十時五十分，開始「迎神」（接神），喃嘸與部份緣首往三聖官迎神（北帝、文昌、關帝），用鸞輿載，並迎廟內諸神返神棚。與此同時，一些村民再與緣首分成幾個小隊，往迎圍內外以及鄰近諸山的其他社神、伯公、山神、井神，置在「三聖」旁。不過，以上諸神，只有三聖是以神像（行身）出現，其餘的都是以紅紙寫上名稱代替。迎神亦包括彭氏的祖先神位，亦是紅紙代替，一是「宗族祖考桂公彭公之神位」，另一是「隴西堂上彭氏歷代祖先」的神位。此外，在彭氏宗祠內恭奉的烈士神位亦迎出來。而彭氏祖先神位與烈士神位是分別安置在獨立的神棚內的。

下午二時，開始奉神啟壇的儀式，所有喃嘸和緣首（小童九名）齊集三清棚內。首先，喃嘸持酒向壇祝禱，然後交給緣首飲，之後，頭名緣首持「意者亭」領其他緣首拜「五方天」（小幡），接漂喃嘸向五方祝拜，並用口向神壇噴出酒水，以潔淨之，又手持五雷令祝禱叩首，再以香點茶，領緣首們到神棚及食棚拂水潔淨，最後返回神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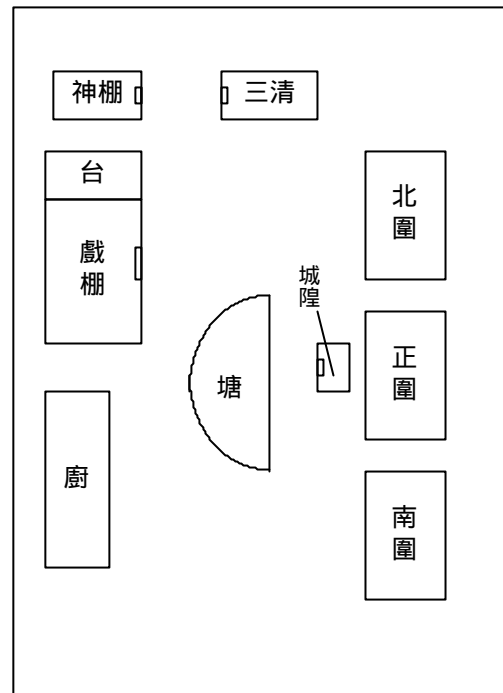
三時二十分，喃嘸在神棚上香，三鞠躬。由嘉賓為舞獅點睛，然後放氣球和放生（白鴿）。這一環節應是粉嶺鄉向重要的來賓表示謝意，而非打醮儀式的一部份。

下午三時，喃嘸在三清壇前上第三表，起首是「讀榜」，再以雞冠血為榜文「開光」入封，又以雞冠血為功曹馬「開光」，又為功曹「簪花掛紅」，再以榜文交在功曹手上。喃嘸持五雷令「吩咐」功曹傳送文書上天，又持「笏」祝拜一番後燒爆竹，然後焚功曹馬。

正醮初日（十一月十四日）

正醮初日開始，每天喃嘸率眾緣首向所有神棚朝懺三次，通常在早飯、午飯和晚飯後做。朝懺是朝拜，而懺，據說是村民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向神懺悔。

下午三時三十五分，喃嘸進行「啟人緣榜」。喃嘸先在三清壇前肅正衣冠，敬拜三清和五方。之後，緣首及喃嘸互相賜酒，緣首將毛筆交給喃



圖二：神棚與戲棚位置圖

嘸，他以口含毛筆仰首「畫符」，之後，其他喃嘸在榜文上寫上一個吉祥語（如「生福心」，「善與人同」，「生祿心」，「生慈心」等）和自己的姓名，再以朱砂圈起，待緣首也簽名後，村民便將榜文貼在圍門及牆外，由正圍伸展至南圍，正對漂漁塘張貼，榜文是在文字上報告上天這裡正舉行太平清醮，並書寫所有參與者（粉嶺彭氏，以戶主為首，下列妻兒），約共三百六十戶，榜文會由喃嘸朗讀一次，但之前仍需以雞血開光及為社稷大王「簪花掛紅」。啟榜是村民頗有興趣的環節，他們極緊張自己的名字是否已經寫在榜內。

當村民貼人緣榜的時候，其他村民亦張貼特別的榜於其他的棚內，包括城隍（玉皇），齋廚及大士王。其中城隍是綠榜，齋廚是紅榜，大士王則黃榜。

八時四十分，道士三人，於三清壇前進行「分燈」的儀式，先是喃嘸（持笏）頌讀科儀書，再頌讀黃紙符文（分別是「雷神都司」、「奉行諸科司神」、「召陰符」及「召陽符」），頌後將符文焚化。之後，再將蠟燭九支分給九名緣首。據村民所述，分蠟燭即分燈，亦即「分丁」，希望可使村中

由此人丁興旺。

分燈之後，立即舉行了「禁壇」的儀式。根據田仲一成《中國的宗族與演劇》所述，禁壇是道士用以潔淨神壇的禮儀，（頁412），此項儀式中，緣首須拿「意亭」向三清叩首行禮，喃嘸誦讀科儀及置於意亭中的榜文，喃嘸又用五雷令敲僵，並向天噴水，據說這是恭奉神靈到壇，每請一位做一次。接漂一手持短劍，一手持雞，並以雞冠蘸酒在四角方位畫符。接漂提漂火盆於四角方位畫符，又以劍穿符紙、燒符祝拜後將五方幡置於壇的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

#### 正醮第二日（十一月十五日）

早上十時開始，喃嘸、緣首及眾多村民齊集，由粉嶺圍出發「行香」，沿途鳴放爆竹及舞獅。過程是拜祭粉嶺圍及與之有關的土地及神廟，整個隊伍經掃管埔至上水周二院，最後折返粉嶺樓的寅峰祠作為完結，歷時二小時。

晚上八時祭小幽，於戲棚側空地舉行。喃嘸全身黑衣黑帽，先誦讀意亭下的榜文，奠酒，又持香祝拜，並把香擲向壇前。喃嘸又將二判官像運至供桌側，說話一番，再放回原處；又將梁周記（紙紮雜貨店）如是運至說話，又搬回原處。之後命村民燃點地上的蠟燭（插在蘿蔔上），又把香插上，把白飯和齋菜撒在兩旁元寶的中間地方，奠酒後，燒衣，最後放爆竹。

祭小幽是分衣施食給十八男鬼，十八女鬼，共三十六個小鬼。這儀式之前是所謂「賣雜貨」，一般來說，道士二人以對答的形式向村民道出警世教訓，內容輕鬆好笑。然而於這次粉嶺打醮，是項對答取消，據喃嘸張海告訴我們，這是由於缺乏拍擋的緣故。

接漂祭小幽的是迎聖（晚上十時），這儀式是在戲棚的另一空地進行，所迎的聖包括三清、三聖、城隍、張天師及彭氏祖先九位，分別置於九張供桌上的椅上，椅上有傘，九名緣首分別置於九位神仙之旁，從這來看，在這個儀式中各神的地位是平等的。

喃嘸先誦讀榜文，之後舞劍，祝拜，將榜文置放於彭氏祖先旁的功曹馬上，然後將馬焚化。再持五方幡禮拜三清、三聖、玉皇、張天師及彭氏祖先。最後，緣首向迎聖叩拜，再向各神上香及上燭。

迎聖完畢後，喃嘸以白布於神壇前搭一法橋，置花於盒內，放於橋上。經喃嘸唱花歌後便開始賣花，緣首及村民均可購買，只要將錢放於紅封包裡便可買花，村民相信該花有一種神聖的含義。完後，送神經法橋歸位，時晚上十一時。

#### 正醮第三日（十一月十六日）

除朝懺外，下午一時進行走文書（走赦書、走社書）。

赦書是以紅線纏緊在黑色的功曹馬上。由其中一名村民背負走，假裝馬兒是自己跑動的。其他村民則在後面追，由於該背馬者跑得非常快，所以根本沒有人（包括我們在內）能夠趕上，只知他經過了雞嶺村，最後跑至到祖墳側。有趣的是此時馬兒留在山上，眾緣首則於山下大喊「阿爺下山」。據他們解釋「阿爺即天公爺爺，希望天公下來接他們的天書，如此數分鐘後馬兒折返圍村內。

在正圍與漁塘之間空地，喃嘸把赦書取出，坐在桌上的椅上，並以兩傘遮天，面向其餘兩名喃嘸及眾緣首誦讀文書，然後再入封放於馬背上，持五雷令及短劍祝拜並向馬兒噴水，最後焚化黑馬及放爆竹。

下午四時三十分，是「放生及放水燈」，亦是漁塘邊舉行，先在漁塘的欄杆插上三盞放生燈，另外三盞則放在漁塘上，隨即又放生金魚和雀（相思），最後燒爆竹並向塘撒米飯及齋菜。

是晚祭大幽，不過於祭大幽前村民先燒掉幡亭，然後將亭旁的幽燈點漂拿走，集齊三支幽燈至大士王棚燒掉。

晚上九時四十五分，喃嘸們於三清壇後的草地上祭大幽。儀式開始時，喃嘸雙手持鈴，一邊誦冥書，一邊搖鈴，然後由男性村民分配香燭（女性雖不能參與工作，但亦可觀看），喃嘸將香燭、蘋果及菊花向壇前拋擲並誦讀榜文，之後村民分施衣

紙、芽菜及飯，並燃點香燭。村民此時抬大土王出巡，先由大土棚經過祭壇、神棚、圍門前的空地村口、籃球場及祠堂等地方，最後折返大土棚，焚化衣紙，焚化大土王，並燒多串鞭炮。

十一月十七日

這日沒有三朝三懺，早上是拉鴨扒船，這是一項潔淨村中污穢的儀式，喃嘸準備一隻紅船，一隻鴨子，均由緣首抬負，這一行列須經過全村每一戶，每戶的村民會將一些代表污穢與疾病的東西如炭、麻豆連元寶、香枝放在船中，尾隨的緣首會讓鴨子飲每戶門口旁邊預早擺放的水（用盆子盛載

漂），最尾的緣首則負責取「利是」，之後由喃嘸走入屋內噴符水，最後，紙船於村附近的草地焚化。

拉鴨扒船之後是酬謝緣首，緣首由小童組成，他們的身份好像是村民參與打醮時的代表。據說粉嶺彭氏選擇緣首的方法是問杯，一連十次均中聖杯方可，而每位緣首均獲酬勞（這次打醮每位緣首的酬勞是一萬元）。這時法事基本結束，他們亦可獲得另一種酬謝，每人均往三聖神壇上取一斗米（紅色），米斗中除米和葉外，亦有憑照一張保佑緣首一家，緣首會將米斗置於祖先神壇上。

下午會進行送神（三聖）回三聖宮，法事遂完。

---

## 香港歷史檔案處所藏檔案類地圖簡介

### 香港歷史檔案處

歷史檔案處除收藏案卷、私人手稿、照片、政府出版物外，還收藏了一批為數不少的地圖，當中最早的藏品甚至可遠溯至香港開埠初年。這類地圖藏品可為學者提供一種非純文字類資料，幫助他們研究。

歷史檔案處所藏的地圖可分為檔案地圖及非檔案地圖兩大類。檔案地圖是指政府部門、組織機關甚至個人在公事過程中產生和接收的，而又保留下來作日後參考和公務佐證之用的地圖。歷史檔案處的檔案地圖主要是來自下列兩個部門：

- 一、 英國軍部及軍事人員——主要為皇家工兵軍團(Royal Engineer)所繪製的地圖，為數近四百張；
- 二、 香港工務司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及其前身——測量總長辦事處(Surveyor-General's Office)所負責測繪的地圖或圖則，為數三百四十六張。

眾所週知，大部份的政府檔案在香港淪陷期間已經被銷毀，而檔案地圖亦不能倖免。為了填補這方面的缺陷，歷史檔案處從

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處購買和複印了很多繪於二次大戰前的香港地圖。此外，檔案處亦從「港督與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來往公文」(CO129)這檔案類別中複製了不少的地圖出來，方便研究者使用。

非檔案類地圖是指一些非在公事過程中產生的地圖，或者該地圖並不屬於檔案系統內，又或者與原本所屬的檔案失去了脈絡關係的地圖。檔案處藏有的非檔案地圖約有一千三百多張，它們主要是地政署下的測繪處(The Survey's Mapping Office of the Lands Department)作銷售用途而印製的地圖。

除由政府部門移交的地圖外，歷史檔案處也收藏不少私人機構和組織(如地下鐵路公司、牛奶公司)所捐贈或托管的地圖。

歷史檔案處的檔案類的地圖所涵蓋的地域範圍很多樣化，有些是香港全境地圖，以至包括香港鄰近區域的地圖，有些是香港某個區域，甚至小至某個鄉村或某條街道的地圖，這些不同地域範圍的地圖可用於宏觀性的區域研究或個別地區的微觀性研究。歸納來說，檔案類地圖的內容可分為以下六大

類：

#### 一、 開埠早期之地形勘察圖：

本處所藏最早的地圖可追溯至一八四一年（編號二四六、二零七、一六三和二八九等）。其中較為人熟知者包括一八四五年由皇家工兵軍團的哥連臣中尉（Lieutenant T. B. Collinson）負責繪製的香港地形圖（編號五十三至五十七）。該圖是香港首張的地形圖，內容詳盡，除載有道路、小徑、水道、耕地、鄉村和主要建築物外，地圖更以垂直間距一百呎的等高線來顯示地勢，開創了以等高線條來繪畫香港地圖的先河。這些地圖對於了解香港開埠初期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貌有很大幫助。

#### 二、 新界地圖：

檔案處另有一些由英國測量局及軍部在一八九八年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繪製的新界界址地圖。這批地圖是研究新界歷史的重要資料，我們從中可以明瞭新界內的區域劃分、村落分佈和某些地方原來之名稱等。

#### 三、 軍事地圖：

這類由英國軍部及軍事人員所繪製的軍事地圖為數接近四百張。這類地圖中約佔一半是有關英國軍方在香港海陸防守據點的地圖（如編號一一三、一二四、一七二、三零八和三五一），其中以一八九一至一九零零年間繪製的地圖為數最多，達一百零四張，而一九零一至一九一零年以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年所繪製的地圖，則分別有五十七和五十八張。此外，在這類地圖中又有大量有關香港軍事用地、軍營和軍事設施（如軍火庫、船塢，甚至戰艦等）的地圖及平面圖。它們是研究英軍在香港軍事部署之重要資料。

#### 四、 填海及海岸線變化圖：

香港自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進行大規模

的填海工程，而原來的海岸線也因而產生巨大的變化，不過，藉著一些有關不同時期的填海區域的地圖和填海計劃及工程圖，我們便可了解箇中的變化（如編號四、一三八、一六三）。此外，檔案處也藏有一些有關修建香港沿岸堤壩的地圖。以港島北面的堤壩為例，對照一幅平面圖（編號一四六）和另一幅（編號一五三）後，便可以知道該在一八六七年颱風吹襲後的損壞情況，以及其後在一八九零至一九零四年所興建的堤壩的模樣，而有關較近期的香港海岸圖，則有地下鐵路公司捐贈的數幅海港沿岸地圖（編號二零七至二零七a）。這些有關不同時期的填海區域的地圖和填海計劃及工程圖，對於我們研究香港填海工程之發展及香港海岸線的變化，幫助很大。

#### 五、 市區發展與地段標示圖：

檔案處的地圖藏品中，有很多是個別鄉村或區域之地圖，包括有大角咀（編號三七）、旺角（編號三八）、土瓜灣（編號三九）、荔枝角（編號二三四）、香港仔（編號六至十二）、長洲（編號六二）等地區。這些地區在經過都市化和工業化的洗禮後，現在已經喪失了原有之鄉村格局，變成為市區或人口密集的区域。不過，我們透過這些地圖，仍可找到昔日這些地區的一鱗半爪。

#### 六、 建築物平面圖：

檔案處的地圖收藏中，有不少是一些歷史建築物的平面圖，譬如港督府、最高法院、域多利監獄、香港大學、中央郵局、警察總部等。這些建築物的平面圖，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些已拆掉或經過改建的歷史建築物的原貌。

顯而易見，如果學者可以在使用文字類檔案或資料的同時，亦兼及使用地圖類資料，相信對他們的研究會裨益莫大。

##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Lai Chi-kwong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Introduction

The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as established in November 1996 in recognition of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business traditions of Asia. Its primary aim is to strengthen links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s as well as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both Australia and Asia. Moreover, the Centre will help the Australian business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Asian way of doing business.

The Centre is a cooperative venture involving acade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 other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It brings together historians,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who have undertake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projects examining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East Asia. Although the Centre is a newly established institute, several international eminent business historians are already affiliated with it.

### Publications

The Centre is currently sponsoring an electronic journal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proposes to develop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 Papers on Overseas Chinese, trade, business networks and emigration, East Asian Business History discussion paper, and Asian Business History Series. The Centre's Associates serve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entre's publications.

### Collections

The Centre collects research materials related to Asian business history studies. A total number of 120 pieces of optical disks of Chinese archives and 30 volumes of the Title Deeds Files of Shanghai are in order. Other material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he Centre include *Queensland Asian Business Weekly*, *World News*, Library Holdings on Asian Business History, publications of Centre associates, and newsletters from major research centres

### Affiliates

The Centre has three types of Associates: (1) Research Associates: includ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2) Corporate Associates: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and (3) Student Associates: including graduates and advanced students in Asian Business History.

###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A particular strength among the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staff associated with the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is Shanghai studies. They also supervise theses on Asian Business History in particular,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sia in general. Other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Australian-Chinese relations, Japanese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projects currently conducted by the Centre Associates include: (1) Ming-Ch'ing Economic history; (2) Business in Shanghai: Past & Present; (3) Risk and

Chance in Modern China; (4) Australian-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5) Japanese Technology.

The Centre runs a series of public lectures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the Asian Languages Department. The Centre will also run occasional conferences or series of workshop on Business in Shanghai. Conference and lectures series run by the Centre in the years 1996-97 include:

(1) Business in 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Conference (March 1997)

The conference was attended by a forum of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Topics covered include department stores, banking, stock market, technology transfer & commercial culture, contemporary Shanghai enterprises, and Shanghai capitalists in overseas trade. A conference volume is going to be published.

(2) Asian Business History Lecture Series (Semester II 1997)

(3)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Lecture Series (March 1996 - May 1997)

(4) The Overseas Chinese Seminars (Semester II 1996 - Semester I 1998)

### Location and Contact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Room 527, Gordon Greenwood Build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4072, Australia

###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Dr Chi-kong Lai, Director,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4072, Australia  
Ph: (07) 3365-6339  
International: 61-7-3365-6339  
Fax: (07) 3365-6266  
Email: c.lai@mailbox.uq.oz.au

### 讀者來函

本人現正從事 1880 年至 1945 年間澳洲華僑與僑鄉來往聯繫的研究，其中對中山華僑尤感興趣。如有任何人士對此問題有所了解，或能提供相關資料，懇請與本人聯絡。通信地址如下：

Could anyone interested in or with knowledge about the nature of continuing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who went to Australia and their districts of origin, in particular people from Zhongshan county, in the period from about 1880 to 1945 please contact:

Michael Williams (韋邁珂)  
35 Henson Street, Summer Hill 2130, Sydney, Australia.  
E-mail: banbei@wr.com.au Ph / Fax: 61-2-97986674

# 「十八世紀的嶺南」研討會

廣東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會  
中山大學歷史系  
《學術研究》編輯部  
華南研究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日期：1997年12月13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研討主題：十八世紀嶺南市場發育與社會變遷，  
亦歡迎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報告。

費用：會議不收取任何費用，惟交通、食宿費用由  
與會者自理。（會議可以為來自廣州以外地區的與會  
者安排預訂房間）

報名辦法：有意參加者請於12月10日前，將姓  
名、服務機構、報告題目等，告知中山大學歷史系  
陳春聲先生或劉志偉先生。需預訂房間者，請於11  
月30日前告知。

聯繫辦法

通信地址：中國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歷史系

電話：86-20-86681270

傳真：86-20-84196714

Email：hssccs@zsu.edu.cn（陳春聲）

hsslzw@zsu.edu.cn（劉志偉）

---

## 華南研究會會務報告

### 九七至九九年度幹事會名單

會長：張兆和  
副會長：蔡寶瓊 鍾寶賢  
財政：黃永豪  
秘書：張瑞威 何傑堯  
總務：馬木池

### 華南研究會會徽設計比賽截止日期押後

本會日前曾向各會員發出徵求會徽啟事，為吸引更多會員參與，今特將截止日期延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凡投稿者皆可獲贈紀念品一份，作品最後獲選為本會會徽的設計者，可獲贈獎金港幣壹仟圓整。投稿請寄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本會收。

### 華南研究會會員更改地址回條

各位會員在1995-1997年間，通訊地址如有變更者，請填妥下列回條，並寄回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華南研究會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五)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六) 本刊不設稿籌。
- (七)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八)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馬木池。
- (九)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蔡志祥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

## 募捐啟事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創刊以來，我們都是以免費方式，寄贈國內外各有興趣者。由於索閱者眾，印刷與郵費的負擔日重，故希望各讀者能慷慨捐款，支助本刊繼續出版。由於行政處理上的困難，現只接受港幣現金支票捐款。

在1997年7月至10月期間，承蒙下列人士捐款，本刊仝人特致鳴謝：

劉績	\$600
Prof. E. Wickberg	\$600
Wong Yiu-cho, Joe	\$500

### 捐款回條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捐款數目：\_\_\_\_\_

捐款辦法：

支票：抬頭請寫「華南研究會」，將支票連同捐款回條寄回，地址如下：

香港西貢清水灣道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收

###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姓名(Name)：\_\_\_\_\_先生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_\_\_\_\_

電話(Phone)：\_\_\_\_\_ 電子郵箱(E-mail)：\_\_\_\_\_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九期

華南研究會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程美寶、馬木池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清水灣道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香港科技大學 c/o Humanities Division

人文學部轉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南研究會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schina@usthk.ust.hk